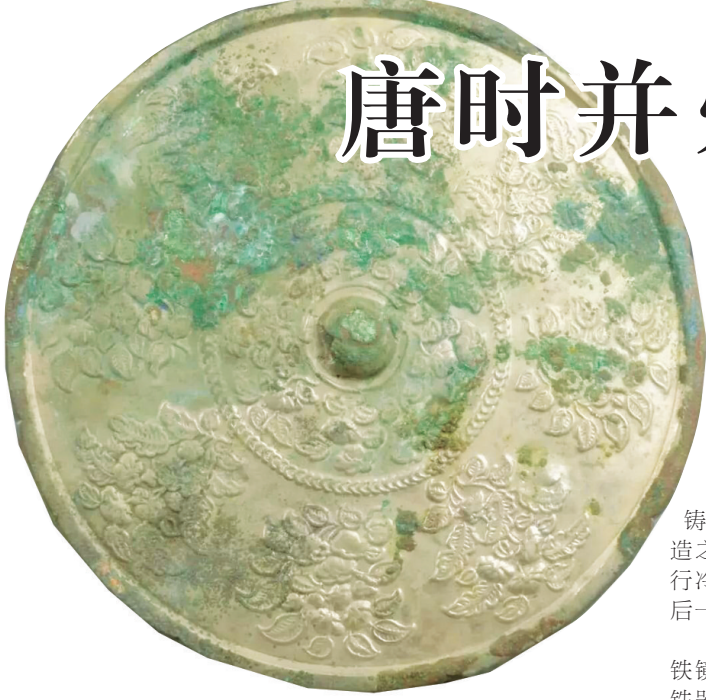




八花枝菱花形镜:晋源区文物旅游局藏,直径29.52厘米,是太原地区发现的大型唐镜代表。(资料图片)

唐代铸镜业虽以扬州最负盛名,而并州因兼产铜镜、铁镜,在北方独树一帜,两种镜子并贡朝廷,年年由晋阳运往长安。

《新唐书·地理志》记,太原府土贡,铜镜、铁镜列于诸物之首,其后才是马鞍、梨、葡萄酒之类。《通典·食货六》亦载,天宝年间并州岁贡铜镜,虽不算多,却件件精绝,绝非寻常坊肆所能比。所谓土贡,指的是地方将最精良的物产献于朝廷的制度,唐代法令明文规定,贡品须为本地所产,且价值不得超过五十匹绢。太原铜镜、铁镜能位列贡品,足见其在大唐手工业版图中的分量。

太原铸镜业的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山西自古铜铁兼产,晋南绛州更是天下铸钱重地,天宝年间,全国设九十九炉铸钱,绛州独占三十炉,几乎占了三分之一。太原地处河东道腹心,北依太行,西临吕梁,又有汾河穿城而过,水运便利,煤铁铜锡诸矿藏富集。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加上自春秋晋国以来绵延不断的冶铸传统,使得太原工匠在铸镜这一行当有了不同寻常的底气。

唐朝太原铜镜最风光的时刻,当数每年八月初五千秋节。唐开元十七年(729),唐玄宗李隆基将自己的生辰定为千秋节,举国休假三日,君臣同乐。这一天,大臣们要向天子敬献铜镜,天子则将金镜回赐给四品以上的官员,玄宗曾

在我的家乡清徐县孟封镇孟封村,若问起老一辈人心中最深的遗憾,恐怕非那座曾经矗立在村东北角的玉皇阁莫属。

如今,站在孟封中学东南侧那片曾经是打粮场的场地上,眼前不过是一片寻常的土地和几处院落。但在300多年前,这里却矗立着一座气势恢宏、设计独特的楼阁,直插云霄,曾令方圆百里为之惊叹,那便是玉皇阁。

玉皇阁始建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集庙宇、戏台、过街楼阁于一体,当地俗称“阁儿上”。整座楼阁跨村主街道而建,底层行路,楼上唱戏,阁内供奉,是国内少见的过街戏阁一体古建筑,规模在乡村古阁里堪称翘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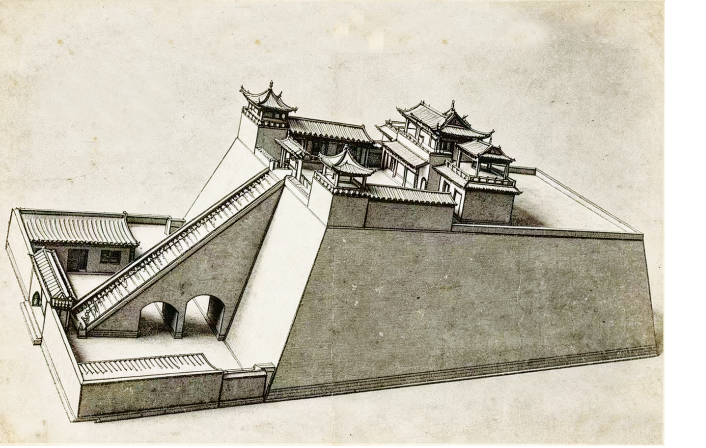
家乡的老人总爱用一句顺口溜来形容玉皇阁的名气:“锦州的狮子应县的塔,比不上孟封的玉皇阁。”话虽略带夸张,却是孟封人骨子里滚烫的骄傲。它不只是一座庙宇,更是一方水土的精神图腾,见证过村庄的繁华,也承载过岁月的跌宕。

玉皇阁之美,贵在一个“奇”字。它不同于寻常古建筑的方正对称,整体呈长方形,分上、中、下三层,通高约十五米。远远望去,飞檐挑角如鲲鹏展翅。阁内供奉着道教至尊玉皇大帝,香火曾盛极一时。最妙的是它的二层,楼台后部竟宽出了一方宽阔的大平台,这在传统阁楼建筑中实属罕见。

关于这个奇特格局,村里流传着一个带着几分神秘色彩的故事。清光绪年间,玉皇阁大规模重修,工匠们试图在三层的飞檐下再筑楼台,却屡遭挫折,“前面盖起后面塌,后面盖起前面塌”。或许是天意,抑或是地基难承其重,最终只得作罢,只保留了那个开闢的平台。这种“未完成的美”,反倒成了玉皇阁最独特的标志,让它在一众古建筑中卓然不群。

然而,这座承载了孟封人几百年骄傲的宏伟建筑,终究没能躲过战火与劫难。日寇铁蹄踏破家园时,玉皇阁因其地势高峻,被侵略者强占为碉堡据点。日寇败退后,阎锡山部队又接踵而至,玉皇阁饱受摧残。1946年至1947年间,阎锡山的军队修筑防御工事,那些曾令无数匠人叹服的精美砖石,被一车车拆下,运去砌成冰冷的碉堡——文化的筋骨,化作了战争的骸骨。

今人只能在1935年的老照片里,追忆玉皇阁曾经的宏伟。如今走在孟封街头,每听老人提起“阁儿上”,语尾总拖着一道长长的叹息。古建虽毁,乡愁难断,而我们回望的,不只是那座楼阁,更是那段厚重的历史。



孟封玉皇阁立像示意图(或永春侯图)

唐时并州镜 照见长安月

张宇煊

作诗云:“铸得千秋镜,光生百炼金。分将赐群后,遇象见清心。”史籍记载,太原所贡铜镜曾用于千秋节庆典。每年入秋之前,晋阳城中的铸镜作坊总会忙碌起来,工匠们要在规定时日之内,将贡镜铸造、打磨、装帧完毕,再装入铺着锦缎的木匣,沿汾河南下,过黄河入渭水,一路送进长安。

现代检测发现,唐代铜镜主要由铜、锡、铅等金属合铸而成,这样的合金使得镜面白亮如银,不易锈蚀。在铸造之外,太原工匠还使用淬火与回火的工艺对出炉铜镜进行冷热交替的反复处理,以此大大提升强度和塑性,待到最后一道工序完成,镜面便会清亮平整,照镜纤毫毕现。

铜镜已算得上工艺绝妙,但太原镜业中更出名的则是铁镜。铁本易锈,何以照人?古代太原的工匠匠心独运,让铁器得以焕发光彩,声名远播,有一位太原籍宰相甚至专为铁镜写下了一篇千古传颂的赋。

乔琳,天宝初年进士及第,曾任监察御史、怀州刺史,唐



大历十四年(779)曾拜相,但上任80余日便被罢相。这位老臣一生跌宕起伏,他给家乡留下了珍贵的《太原进铁镜赋》。赋中写道:“晋人用铁兮从革无方,其或五金同铸,百炼为钢。雕镂而云龙动色,磨莹而冰雪生光;烂成形于宝镜,期将达于明王。”“从革无方”出自《尚书》,说的是铁可塑

性极强,可柔可刚,变化无穷。“五金同铸”指的是铁镜铸造中会将诸金属按比例熔于一炉,再经过“百炼为钢”,反复锻打折叠,去除杂质,使铁变为精钢。这样锻造出来的镜面,经过精心“雕镂”,就能使铁镜背面的盘龙栩栩如生,即“云龙动色”。“磨莹而冰雪生光”指的是通过打磨,镜面光洁如雪似冰,虽不比铜镜明亮,却自有一种沉毅内敛的光泽。

这篇赋并非夸大其词。2001年,太原市晋源区晋源镇果树场内发掘了一座唐代墓葬,墓主温神智,卒于唐开元十八年(730),他的墓葬规格虽不显赫,却留存了一面铁镜。铁镜残径11厘米,虽已残破不堪,却是太原出产铁镜的重要实物例证。镜上依稀可见云龙纹饰的残痕,与乔琳赋中“雕镂而云龙动色”的描述遥相呼应。

早在唐代,煤炭便已经成为太原冶铸业的重要燃料。2023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了一项重要发现:晋阳古城二号建筑基址范围内,发掘出一处唐代中期的手工业作坊遗址。这处遗址先后清理出34处灶址、642个煤渣坑,以及坍塌残片、铜铁残渣、水渠和蓄水池等。这个作坊位于一排面阔四间的简易房址内,房址西侧还有数个规整的长方形灰坑,坑壁带水渍痕迹,推测是用于淬火的水坑。相较于木炭,煤炭燃烧温度更高,持续时间更长,更适合需要高温熔炼的铸镜业,作坊遗址中铜渣、铁渣并存,说明这里既炼铜也炼铁,铜镜、铁镜的铸造或许在同一处工场内完成。

这座作坊紧邻隋代瓷窑遗址,说明这一带是唐代晋阳城的手工业集聚区。城中工匠们白日烧炉铸镜,夜晚煤火映红半边天际。那时的太原,号称“北都”,与京师长安、东都洛阳齐名,城内24道城门日夜开关,商贾工匠往来如织,一派“楼台相望,宫阙巍峨”的盛大气象。

如今,千秋节早已成为历史,乔琳的《太原进铁镜赋》也只在《文苑英华》中留存,唯有博物馆展柜里的那一面面铜镜、铁镜,仍静静躺在那里,镜面虽已斑驳,却依旧映照着千年之前并州的镜色、盛唐的光华。

莫把晋曲归秦腔

马绍民

蒲州梆子的历史记载虽然目前没有在古代文献中找到记录,但在民间留下了很多历史痕迹。

1951年《新戏曲》第二卷《谈山西梆子》一文中记载,吉县龙王辿有一通立于明嘉靖年间的《重修乐楼记》碑,碑文中有“正月吉日由蒲州义和班献演”的内容;河津市小停村古戏台建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戏台上留有“荣邑(今万荣县荣河镇)新盛班到此一乐也”的题壁,戏台上标的《鸡家山》《天台山》《少华山》等剧目都是梆子传统剧目。这些资料说明,在明代中晚期,蒲州梆子已成为较成熟的剧种。

1963年,晋南青年蒲剧团进京演出,著名历史学家吴晗题诗两首祝贺,其一为:“嘉靖蒲梆久擅场,腔高板急谱官商。根深更喜新枝茂,赢得声名回故乡。”其二为:“白沟港口两地名,老将忠臣励后生。卫国除奸歌业绩,京华倾听义和声。”诗中的“嘉靖蒲梆”,指明嘉靖朝兵部尚书杨博(蒲州人)五十寿诞,家乡蒲州梆子戏班进京贺寿;“白沟港口”,是青年蒲剧团新编剧目《白沟河》和《港口驿》;“老将忠臣”“卫国除奸”是杨博事迹;“京华倾听义和声”,为杨博贺寿的蒲州戏班,正是山西吉县《重修乐楼记》石碑上刻的那个“蒲州义和班”。吴晗先生是严谨的学者,不会没有根据地向壁虚造。

秦腔和蒲剧谁是鼻祖

蒲剧的发源地是山西蒲州(今永济),秦腔的发源地为陕西同州(今大荔)。今人争论秦腔和蒲剧谁出现更早,除了罗列证据,还往往比较两个地区谁更具备戏曲产生的文化土壤。在这方面,地处河东地区的蒲州更具优势,这里自古就是文人扎堆的地方。但是戏曲的产生,不一定与这样的人文环境直接关联。恰恰相反,在明时从事戏曲表演的艺人地位卑贱,甚至固化到“世世子孙不得与民齐齿”。

由于明代的政治原因,蒲州集中的“乐户”更多一些。然而蒲州和同州隔河相望,相似的方言、民俗和音乐土壤,共同孕育出“山陕梆子”,然后析为同州梆子和蒲州梆子。之后,同州梆子和蒲州梆子像南戏析为昆山腔和弋阳腔,弋阳腔再流入徽州成为四平腔,流入北京成为京腔、流入卫辉成为卫腔一样,开枝散叶、繁衍发展,同州梆子流向西安成为秦腔,而蒲州梆子向东、向北流布,衍生出上党梆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乃至越过太行山,影响到河北梆子等更远的剧种。

从源流上看,显然蒲州梆子繁衍出了山西梆子家族和河北梆子,不是“从秦腔过来的”。

如果非要为秦腔和蒲剧(实际上是同州梆子和蒲州梆子)分出先后,判断谁更领先一步,依目前的文献资料和其他方面的考据,目标不可能实现。对山西人来说,山西现存古戏台2800余座,占全国存量的70%多,保护好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比打赢一场嘴仗更能获得自豪感。

白谦慎先生《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个个案研究》中,引魏一鳌致傅山信说明了傅青主与直隶学者的关系:“晋卫,一太行之隔,把臂入林,自当有日。道兄岂无意乎?”

确实,傅山外省的友人中以直隶畿辅出身者为多,其中杨思圣、申涵光、殷岳三人在白谦慎书中更多次出现。这三位甲申时与朋友避祸于太行广羊(阳)山读书,三人的友谊贯穿生命始终,且与傅山多有交集。近读清道光年间成书的《国朝畿辅诗传》(下文简称《畿辅》),内中有一些三子的信息,正好拾掇起来,在白先生大作的基础上稍加补遗。

三子当中杨思圣官做得最大,文名也盛。思圣字犹龙,号雪樵,巨唐人,清顺治三年(1646)进士,曾任山西按察使。《畿辅》里说杨思圣上任雷厉风行,挑灯批阅旧案卷,不到三个月结案360余件,无滥无枉。刚到太原不久,杨思圣就拜访傅山,两人遂结交,但记录不多。《畿辅》存其关于太原的诗作有三,其中《过金粟寺,寺为故晋藩园》两首,现且录其一:

地是王孙造,名因浩劫留。
园花资佛力,畦药足僧谋。
落日千峰迥,汾河一线流。
登临真不厌,仿佛识樵丘。

且容两行闲笔:杨思圣参访的金粟寺,应指金粟园。明嘉靖时,太原人王道行在城墙东南角兴建了一个花园,园中几株大桂树,金秋桂子飘香,故名桂子园。王道行去世后,河东王府购得此园,拓展改建后改名金粟园,为王府别墅。金粟园明末毁于兵祸,据说雍正年间重修,增盖魁星阁与文殊、观音二阁。但看杨思圣的诗,顺治年间金粟园就已经恢复到一定的规模了。

因有政声,杨思圣很快转任河南。离开太原时,杨思圣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但想起未来的仕途,还是作《出太原》以明志:

怅别并州路,远看似故乡。
一年愁与病,远道雪兼霜。
薄禄憎人面,山川润客装。
无嗟游宦苦,不减旧疏狂。

在河南没过多久,杨思圣又迁四川左布政使,可惜染上重病。《畿辅》中记载,杨思圣与殷岳说:“我为庸医所误,殆将不振……太原有高士傅青主者,精医术。若彼至,或可救。”殷岳立即启程,跋涉过河,千里寻青主。《傅山全书》里记载,听到杨思圣病重的消息,傅山说:“世无两犹龙,吾安得坐视。”遂抱病慨然而行,可惜,傅山还未至,杨思圣就去世了。

经此事后,傅山对这位重情义的殷岳颇具好感,两人逐渐熟络起来。《畿辅》里转载朱彝尊《殷先生墓志》,说殷岳作诗不喜律,“平生所作惟五言古风一体,莽莽然肖其为人”。殷岳曾向傅山求字,但傅山实在太忙,一拖就是三年:“伯岩(即殷岳)册子,属写者三年,今付丈所,若过平平时,可致之。”(《傅山致戴廷杖札》)

三子中的申涵光同样和傅山熟熟。申涵光是永年(今属河北省邯郸市)人,在三子中最年轻。《畿辅》里记载,清康熙二年(1663),申涵光应亲戚王显祚(字襄璞)邀请来并,没过多久却要离开。王襄璞问及原因,他说傅山“贫居不能蔽风雨。公以身下之,胜于光之留多矣”。王襄璞于是为傅山捐俸买宅,一时传为盛事。白谦慎写申涵光向傅山求字画的事:“他到山西去拜访傅山时,大概傅山已为他写过字了,他不便不断索求,就请戴廷杖为他代购傅山的作品。”因此,白先生认为申涵光是个知趣的人。《畿辅》里留存了一首申涵光唱酬傅山的诗:

曾约西山访钓竿,世事安设榻待君欢。

乱离苦忆良朋少,衰病应愁远道难。

晋国山川容白虎,中原天地此黄冠。

幸将卷帙传高迹,日向晴窗展画看。

三人与傅山既为良友,傅山还曾不计千里之远去给杨思圣看病,按说有所请托,青主应概无不允。然而白谦慎书中记载的事例,却表现出傅山与人交际的复杂性。当时,申涵光为逝去的杨思圣写传记,想请傅山提供一些杨在山西的政绩。傅山回函说:“犹老官晋时,弟适之淮上。善政实未多到方外耳目。”以其在外游历,推脱了此事。白先生认为,傅山没有提供杨思圣为官事迹另有隐情,不仅是在外未归的理由。即使是至交魏一鳌,傅山在两人见的诗文往来里也没提到他的政绩。身为明朝遗民,傅山从来没有为入仕清朝的官员写过传记。

有一年除夕,青主写诗:

纵说今宵旧岁除,
未应除得旧臣家。
摩云印却有阳雁,
寄得南枝芳信无。

虽然沧海桑田,世事多变,但总有一些坚持是有意义的。



传承傅山文化

消失的玉皇阁

刘书林